

中國哲學史
研究集刊

第一輯



中国哲学史研究集刊

第一辑

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

《哲学研究》编辑部、中国哲学史研究室 编

上海人民出版社

责任编辑 朱一智
封面装帧 范一辛

中国哲学史研究集刊

第一辑

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

《哲学研究》编辑部 编
中国哲学史研究室

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

(上海绍兴路54号)

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市印刷三厂印刷

开本 787×1092 1/32 印张 8.625 字数 188,000

1980年7月第1版 1980年7月第1次印刷

印数 1—10,000

书号 2074·359 定价 (六)0.68元

编 者 的 话

《中国哲学史研究集刊》是不定期出版的中国哲学史专业刊物。它的宗旨是：以马列主义、毛泽东思想为指导，坚持“百家争鸣”的方针，发展和繁荣中国哲学史的研究工作，为实现祖国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服务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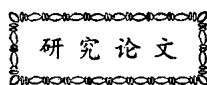
本刊以发表学术研究性论文为主，同时也适当刊载读书札记、书评、考证等方面的著述。

我们希望中国哲学史的专业工作者和业余爱好者，积极向本刊投稿，给我们以支持。我们的编辑水平有限，缺点、错误之处在所难免，诚恳地希望广大读者给我们提出宝贵意见。

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 《哲学研究》编辑部
中国哲学史研究室

目 录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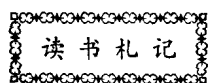
编者的话



论《庄子·内篇》的真伪和时代	张恒寿(1)
略谈《新编汉文大藏经目录》中译本部分的 编次	吕 澂(45)
试论孔子的哲学思想	金隆德(53)
孙臧兵法的哲学思想	钟肇鹏(67)
公孙龙哲学思想研究	许抗生(79)
宋钐、尹文思想初探	李锦全(92)
对荀子论“礼”的几点看法 ——从“断长续短，损有余，益不足” 的解释谈起	丁冠之(107)
略论《淮南子》的哲学思想	于首奎(116)
贵无哲学剖析	孔 繁(125)
郭象《庄子注》的唯心主义本质	牟钟鉴(143)
论僧肇的佛教哲学 ——兼与《中国思想通史》商榷	张春波(159)
试论柳宗元的“统合儒释”思想	孙昌武(186)
关于王夫之认识论的探讨	冯憬远(206)

略论康有为的哲学思想 邝柏林(226)

孙中山的无神论思想初探 肖万源(249)



读《易》管见 刘大钧(262)

论《庄子·内篇》的真伪和时代^①

张 恒 寿

一 试破内外界限，推寻《庄子》书中较古篇目

向来研究《庄子》的论著，多半是对于外、杂篇的时代、真伪探索考证，而对于内篇则往往相信旧说，认为是庄周作品，不轻易论列。我以为要对《庄子》全书进行科学研究，就不能漫信旧说，不加分析。即使内篇真为庄周作品，也须经过审查，重新确定。问题在于根据什么标准进行探索。

前人对于区分内外篇的标准，大约有这样几种说法：有的认为“内篇明理，外篇纪事”；有的认为“内篇理深，外篇理浅”。但内篇虽是明理，外篇却非纪事。内篇虽是明理，但并非全部理深。如《应帝王》篇“阳子居问于老聃”一章，其中若干文句，和外篇《天地》“夫子问于老聃”一章基本相同，但理较外篇为浅^②。如外篇《达生》、《知北游》，杂篇《庚桑楚》、《则阳》等篇，所明之理，有时比内篇为深。王船山是主张外篇多伪的，但他已指出杂篇有比内篇更深刻处^③。可见内篇

① 本文是1963年旧稿《论〈庄子·内篇〉的真伪和时代》一文的第二部分。第一部分的原题目是：《论〈庄子·内篇〉非汉代作品，但题为汉人所加》。发表在《文史》1979年第7期，题目略有改动。

② 详下论《应帝王》一段。

③ 见王夫之：《庄子解》。

理深的标准不够准确。林云铭说：“内七篇是有题目之文，为庄子手订者；外、杂篇各取篇首两字名篇，是无题之文，乃后人取庄子杂著而编著之者。然则或曰外，或曰杂何也？当日订庄子之意，以文义易晓，一意单行者，列之曰前而名外，以词意难解众意兼发者置之而后而名杂，故其错综无次如此。”^①林说以有无题目为区分内外篇标志之一，基本上是可信的。确实，除了内篇有一特别题目之外，别无其他可严格区分的标准。但他说内篇是庄子手订者，则决非事实。考先秦书中虽有把一部分篇目分为内外的先例（如《管子》的《内言》、《外言》，《韩非子》的《内储说》、《外储说》等），而把整个书分为内外篇、内外传，只有到了汉初才盛行起来。如《韩诗内、外传》、《黄帝内、外经》等。特别是淮南王刘安既作了内书二十一篇，又作了外篇甚众，另外又起了一个名称，“号曰鸿烈”，而他和他的门客们，正是历史上最先整理编纂《庄子》书的^②。所以，分《庄子》书为内外篇的，应为刘安及其门客。我曾根据《经典释文·序录》和《文选注》以及俞正燮、武内义雄的考证，相信古五十二篇本《庄子》中有淮南王所作的《庄子略要》、《庄子后解》等三篇解说，并根据内篇名称的奇特，显有纵横影响，结合刘安在政治上的野心和“符应”等词的隐含意义，怀疑内七篇的题目，是刘安门客所加^③。如果这个

① 林云铭：《庄子因·总论》。

② 关于《庄子》书区分为内、外篇的时代及编纂者问题，有刘向说（见《古史辨》第四册，唐兰《老子的姓名和时代考》）、郭象说（见《历史语言研究集刊》六卷四号，傅斯年《谁是〈齐物论〉的作者》）、周宏正说（见郎肇霄：《庄子学案》）等不同意见。

③ 详拙作《论〈庄子·内篇〉产生的时代及其篇名之来由》。见《文史》1979年第7期。

猜测不太误谬，则淮南门客所定的题目，也就不能作为是否先秦庄周所作的标准了。

近代讨论庄子真伪的文章，也多以外、杂篇为考证对象。对于内篇，大多数默认是庄周自己的作品，而不提积极的理由。只有高亨先生提出外篇晚出的六条证据时，涉及到内篇早出的看法^①。其中第四(田成子的年代)、第五(盗跖说汤武立为天子而后世绝灭)、第六(记庄子将死)三证，是很可信的。四、五证尤为一般所公认。但这只证明《胠箧》、《列御寇》等篇时代较晚，不能作为内篇全部早出的证明。第一证说“庄周道术毕具内七中，外杂皆内之绪余”。第二证说“内篇文辞玮琦，外篇气蹙质孺有雕琇之迹”，虽是多数注庄家常提的理由，如说“庄子主要思想，在内篇里基本上有了”，还可成立，但说外、杂篇全是内篇绪余，就有可商量处。因为外、杂篇中有些思想和内篇某些部分相差不多，很难说那个是根本，那个是绪余(详杂篇考证部分)。

第二证从文学作风上看时代、作者，确为探索《庄子》各篇真伪的一个重要环节。内七篇的表现方法，确与外、杂篇中某些篇目，如《刻意》、《缮性》、《骈拇》、《马蹄》、《让王》、《说剑》之类，截然不同。但和《秋水》、《田子方》、《则阳》、《寓言》等篇就不易划界。所以这两个异点也很难作为划分内、外篇时代的标准。

我觉得既然除了有无特别题目外，很难找出区分内、外篇的客观标准。而这个题目又可能是汉人所加，那么我们现在就应首先打破内、外杂篇的严格限界，重新建立一个考察全书的标准。如果根据新立标准，能找出一、二篇可靠的证

^① 见高亨：《庄子今笺》。

据，就可再根据这几篇的证据推寻其他篇的真伪和时代。

我们知道，《庄子》书最先由淮南门客加以编纂、整理，同时认为《庄子·天下》篇所述庄子思想、作风，可为推证是否是庄子的依据。现在就从这些根据上，拟立三个标准，作为考察全书的开始。

(1) 考察《淮南子》以前的典籍，有没有明引“庄子曰”云云，而明见于今本《庄子》者。这一标准，比较明白，不需解释。

(2) 考察先秦书中有没有虽未明引“庄子曰”三字，但察其大意，确实是指庄子学说，而且在今本《庄子》内无可怀疑者。这一标准是指在思想上文句上确能找到联系的，如果思想上大体相同，而在文句上不能断定其出于何篇的，只能作为第二步考察的参考。

(3) 依据《天下》篇所述庄周思想、作风，考察它和今本《庄子》各篇有没有显然符合之处。有没有显然是《天下》篇叙述庄周思想作风的来源。这一标准也是指在思想、文句上有确实联系的。至于思想倾向、文体风格都和《天下》篇所描述的相符，但无明显相似语句的，作为第二步复勘的依据。

这三个标准，只是作为开始考察的一个支点。先看第一步所能证明的是哪些篇目？

首先考察《淮南子》以前书中，明引“庄子曰”云云，而确在今本《庄子》内者，约有数条：

(1) 《吕氏春秋·有始览·去尤》篇云：

“庄子曰：以瓦投者翔，以钩投者战，以黄金投者殆，其祥一也，而有所殆者，必外有所重者也。外有所重者，泄盖内掘。”

这一段文字，见今本《庄子·外篇·达生》篇第四段“颜渊问仲尼”一章，原文是：

“以瓦注者巧，以钩注者惮，以黄金注者殚，其巧一也，而有所矜，则重外也，凡外重者内掘。”

这一段文和上引《吕氏春秋》一段，字句稍有不同，但确实是《吕氏春秋》所本，无可怀疑。

(2)《庄子·外篇·天道》篇有这样一段话：

“庄子曰：‘吾师乎！吾师乎！整万物而不为戾，泽及万世而不为仁，长于上古而不为寿，覆载天地刻雕众形而不为巧’。

《天道》篇里有“素王”、“六经”等名词，已有多人怀疑为汉初作品^①，似无可疑（详外篇考证）。《天道》通篇是议论文，和讲故事、讲寓言的文体显然不同，这一篇也没有故事、人物的问答，所以这一篇引“庄子曰云”，即是引《庄子》之书，也无可疑。这一节文字见今本《庄子》内篇《大宗师》篇第七段。原文是这样的：

“许由曰：噫！未可知也，我为汝言其大略。吾师乎！吾师乎！整万物而不为义，泽及万世而不为仁，长于上古而不为老，覆载天地，刻雕众形而不为巧，此所游已。”

《大宗师》这一段是一个人物的对话，作者把自己的思想假托在许由对意而子的对话中表现出来，说明这是庄子的寓言。《天道》篇引述《庄子》书文，直接说是庄子曰云云，正和现在我们引《庄子》书文，不论出于何人之口，都称为庄子所说一样。所以《天道》篇作者所见的《庄子》有《大宗师》这一段是可信的。^②

① 见武内义雄，《老子、庄子》。

② 我提这一证据之时，还没有看见郭沫若同志的《十批判书》。后见郭说，更觉得这个看法可以成立。任继愈同志认为这是《大宗师》抄《天道》篇，而不是相反，并说这个问题，只能是后者胜，但没有提出为什么《大宗师》篇作者把“庄子曰”改为“许由曰”的理由来，对于《天道》篇中“素王”，“六经”等后出名词，也未加考辨。此说很难成立。

(3)《淮南子·道应训》篇云：

“故庄子曰：‘小年不及大年，小知不及大知，朝菌不知晦朔，蟪蛄不知春秋。’此言明之有所不见也。”

这一段见今本《庄子·内篇·逍遥游》第一章中，原文是这样的：

“小知不及大知，小年不及大年。奚以知其然也，朝菌不知晦朔，蟪蛄不知春秋，此小年也。”

《淮南子·道应训》此段，先引了卢敖游北海的故事，然后引“庄子曰”加以解释，确为引《庄子·逍遥游》文，无可怀疑。^①

《淮南子》以前书，明引“庄子曰”而见于今本《庄子》者，仅查到这三条，不知道有没有漏略。

根据这三条证据，知道现在《庄子》内篇中《逍遥游》第一节，《大宗师》篇“意而子问许由”一节，外篇《达生》中第四节（颜渊问仲尼节）确为先秦庄子作品。

再考先秦书中虽未明白引述“庄子曰”云云，但它的内容，显然是指庄子思想，而且确在今本《庄子》内能找到证据的，有如下一条：

《吕氏春秋·离俗览·为欲》篇云：

“使民无欲，上虽贤，犹不能用。夫无欲者，其视为天子也，与为舆隶同，其视有天下也，与无立锥之地同，其视为彭祖也，与为殇子同。”

又《孟春纪·重己》篇云：

“夫弗知慎者，是死生存亡可不可未始有别也，未始有别者，其所谓是未尝是，其所谓非未尝非，是其所

^①《庄子》文中，常以喻义放在正义之后，朝菌二句在“小知不及大知”句后，正是庄文特点。今本《庄子》加“奚以知其然邪”一句，殊不适当，应根据《淮南子》删去。

谓非，非其所谓是，此之谓大惑。”

据此知《吕氏春秋》成书以前，确有一种“无欲者”或“弗知慎者”，这种人认为天子和舆隶一样，彭祖和殇子一样，死生、存亡、可不可，没有分别。象这种齐一生死、存亡、寿夭、贵贱的思想，在先秦儒、墨、道、法、阴阳百家中都找不到，只有《庄子》书中有这样思想。而表现此种思想最明显的，在内篇《齐物论》中。

《齐物论》云：

“天下……莫寿于殇子，而彭祖为天。”

又云：

“以隶相尊”。

又云：

“虽然，方生方死，方死方生；方可方不可，方不可方可；因是因非，因非因是。是以圣人不由而照之于天，……果且有彼是乎哉？果且无彼是乎哉？”

《齐物论》所说的殇子、彭祖，以隶相尊，方生方死等，就是《吕氏春秋》描写无欲者态度的辞句。特别是彭祖、殇子的比喻，不见于他书和《庄子》他篇，可以说是《吕氏春秋》驳语的来源，所以《齐物论》篇，确为《吕氏春秋》以前的《庄子》篇目。^①

第三条标准，是和《天下》篇对勘看是否符合。在应用此标准前，且先作简单的分析：《天下》篇原文是这样的：

“芴漠无形，变化无常，死与生与？天地并与？神

① 此外先秦书中未明引《庄子》而暗指庄子者，还有几条：如《墨经》中有“谓辩无胜，必不当”，“以言为尽谆谆”等句。又如《荀子·解蔽篇》中“若夫非分是非，非治曲直，非辨治道，非治人道”等句，都是指庄子学说，可作旁证。因无具体相似辞句，故未论列。

明往与？芒乎何之？忽乎何适？万物毕罗，莫足以归，古之道术有在于是者。庄周闻其风而悦之，以谬悠之说，荒唐之言，无端崖之辞，时恣纵而不佞，不以觴见之也。以天下为沈浊，不可与庄语，以卮言为曼衍，以重言为真，以寓言为广，独与天地精神往来，而不傲倪于万物，不谴是非，以与世俗处。其书虽瓌玮而连犴无伤也。其辞虽参差，而淑诡可观，彼其充实，不可以已。上与造物者游，而下与外死生无终始者为友。其于本也，弘大而辟，深闳而肆，其于宗也，可谓稠适而上遂矣。虽然其应于化而解于物也，其理不竭，其来不蜕，芒乎昧乎，未之尽者。”

从《天下》篇这一段看来，其中意义明确的语句可分为三个部分：

(1) “苒漠无形，变化无常，死与生与？天地并与？神明往与？……上与造物者游，而下与外死生无终始者为友。”这是叙述他的宇宙论和人生论的大纲。

(2) “谬悠之说，荒唐之言，无端崖之辞”，“以天下为沈浊，不可与庄语”，“以卮言为曼衍，以重言为真，以寓言为广”，“其书虽瓌玮而连犴无伤也。其辞虽参差，而淑诡可观”。这是叙述他的行文作风。说明这种表现手法是和一切郑重严肃的议论整齐排列的文句不同的。

(3) “芒乎何之？忽乎何适？万物毕罗，莫足以归”，“其应于化而解于物也，其理不竭，其来不蜕，芒乎昧乎，未之尽者。”这似乎是兼指思想和作风两方面而言，大概这种态度，表现在思想上，就是对于百家学说都有点轻视，而没有一种思想是他最后的皈依；表现在文体风格上，就是多设游疑两可追求问题的辞句，很少斩钉截铁滞于形迹的断语。

就是在建立正面的议论，语意也多含蓄，不肯说尽，有时正意和喻意杂出，突然而来。所谓未之尽者，可以说是赞扬也可以说有点批评。

如果我们对于《天下》篇叙述庄周的思想作风所作的分析，大体上可以说通的话，那么就可以以此为衡量《庄子》各篇的线索，看一下，《庄子》全书中，究竟哪些篇中是既有“死生变化”，“天地并与”，“与造物者游”等思想内容，而又有汪洋自恣不竭不蜕的表现作风。特别是哪些篇中，有《天下》篇叙述庄周的相似语句，可以作为确实证明。

我在讨论《庄子》是否汉代作品时，曾经提过从《天下》篇可直接推证出来的，有《齐物论》和《大宗师》两篇。

《齐物论》说：

“天下……莫寿于殇子，而彭祖为天；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。既已为一矣，且得有言乎？既已谓之一矣，且得无言乎？……”

这种理论和《天下》篇所说的“死与生与？天地并与？”互相符合。而“天地与我并生”一语正是《天下》篇“天地并与”一语的来源。

《齐物论》又说：

“人之生也，固若是芒乎？其我独芒，而人亦有不明者乎？”

这种提法，和《天下》篇所说“芒乎何之？忽乎何适？”的提法，互相符合。也正是《天下》篇那一提法的来源。

再看《齐物论》全篇，多半是用参差比喻的方法，表现思想情致，如对天籁地籁的描写，大恐小恐的形容，以及“狙公赋芋”，“罔两问景”，“麋与鹿交”，“梦为蝴蝶”……种种比喻，可以说无一不是用极形象的谬悠支蔓之辞，曲尽其描绘之情

致。

即使在驳斥别人自己建立理论时，也不作十分肯定的形式；全篇结尾之句，几乎无不用“乎”字、“邪”字者；如“果且有彼是乎哉？果且无彼是乎哉？”“既已为一矣，且得有言乎？既已谓之一矣，且得无言乎？”“庸詎知吾所谓知之非不知邪，所谓不知之非知邪？”“恶认所以然？恶识所以不然？”……等等，正是“万物毕罗，莫足以归”。“芒乎昧乎，未之尽者”的具体表现。所以从文辞、思想二方面看，《齐物论》和《天下》篇所述庄周情况完全相合。可以说《齐物论》是《庄子》先秦的篇目。

《大宗师》篇和《天下》篇所述庄周思想、作风有更多相同之处。如：

“子祀子舆子犁子来，四人相与语曰：……‘孰知死生存亡之一体者，吾与之友矣’。”（《大宗师》）

“子桑户、孟子反、子琴张，三人相与语曰：‘……彼方且与造物者为人，而游乎天地之一气’。”（同上）

这就是《天下》篇所述“上与造物者游，而下与外死生无终始者为友”二语的来源。

此外《大宗师》篇描写的人物故事，多半是寓言、卮言之类。如“柳生左时，藏山于泽，铸金踊跃，临尸而歌”以及“虫臂鼠肝、决疣溃痂”等比喻，都可以说是荒唐之言，无端崖之辞的典型。这样看来，《大宗师》篇的大部分，可以说是和《天下》篇所述庄周思想符合的。

除了《齐物论》、《大宗师》两篇外，在思想语句上显然有联系的，有《寓言》篇。如《寓言》第一节云：

“寓言十九，重言十七，卮言日出。”

可以说是《天下》篇“以卮言为曼衍”三语所本。《寓言》全篇

思想内容，行文作风，和具体的语句，大部分和《齐物论》相同。可以说是庄周早期作品，但基本思想在《齐物论》中已都包括，留待论外杂篇时再为论列，这里不把它作为典型庄子作品的重点。

此外《庄子》各篇中，有一部分思想和《天下》篇相合或有些表现方法和寓言、卮言相合者颇不少，但很少是两方面都吻合的，而且没有语句上的联系，所以都不在这里算作从第三标准得出来的篇目，而只能作为论证该篇时的参证。

综上所述，我认为《逍遥游》、《齐物论》、《大宗师》、《达生》四篇中的大部分章节，是先秦庄子的早期作品。但是我们还不能说这几篇的全部，都有同样可靠性，对全篇各章还须作具体分析。不过大体说来，可以作为一个论证全书的基点了。

二 对《逍遥游》、《齐物论》、《大宗师》各篇的考察

以上论证了《逍遥游》、《齐物论》、《大宗师》、《达生》等篇中，有一大部分是先秦早期的《庄子》作品。除了《达生》在论外、杂篇时，再为论列外，先考察一下，《逍遥游》等三篇，是否全篇各章，都有一致的可靠性？是否有晚出或混入的章节？是否具有确定时代的标志？这样就可以找到更能推证他篇的典型材料了。

(1)《逍遥游》。从《逍遥游》全篇看来，只有第一节“北冥有鱼”中的早出证据比较明显。除前述《淮南子》引“大知不及小知”的证据外，其他象“若夫乘天地之正，御六气之辨，以游无穷者，彼且恶乎待哉？”的辞句，可以说和《天下》篇所说“上与造物者游”的意思，很相一致。其中描写鲲鹏的